

面向終末的生命

——卡爾·巴特與愛德華·圖愛森早期著作中的
陀思妥耶夫斯基 (1915–1923)

Life Before the Last Things: The Reception of
Dostoyevsky in the Early Works of Karl Barth and
Eduard Thurneysen (1915-1923)

洪亮

HONG Liang

作者簡介

洪亮，香港中國神學研究院助理教授；香港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特約研究員

Introduction to the author

HONG Liang, Assitant Professor, China Graduate School of Theology; Adjunct Researcher,
Hong Kong Institute of Sino-Christian Studies.

Email: thinkthankster@gmail.com

Abstract

This is a summary of the author's doctoral dissertation published in 2016, in which Eduard Thurneysen's impact on Karl Barth's second revision of his commentary on the Epistle to the Romans (1922) is fully explored. The author looked through the correspondences from 1915 to 1923 between Barth and Eduard Thurneysen, who was a proofreader of the Barth's manuscript of the commentary as well as the author of *Dostoyevsky*. Moreover, Barth's assertion in the "Preface" of 1922 version that *Dostoyevsky* influenced both him and Thurneysen is in fact a retrospective reconstruction because it does not correspond to the historical facts reflected by their correspondences. The author discovers that Barth and Thurneysen are not "passive" receptors of Dostoyevsky, instead, they have projected their eschatological reading of "life before the last things" onto Dostoyevsky's characters in order to express their own understanding of eschatology. Thirdly, the author affirms Thurneysen's original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 to the beginning of dialectical theology, namely the concept of perspectivism presented in his book *Dostoyevsky*. In the 20th century theological historiography, the eschatology in Barth's *Romans* has been read as a "theory of catastrophe," and the author corrected this reading. It also points to the implied theological anthropology in the eschatological thinking of the early Barth and Thurneysen.

Keywords: Dialectical Theology, Life before the last things, Perspectivism, Theology of Life, Sovereignty of God

在《羅馬書釋義（第二版）》前言中，巴特提及修訂該書第一版的四個因素^①，其中對陀思妥耶夫斯基與克爾凱郭爾的閱讀與接受被視為因素之一。這個言之鑿鑿的判斷左右了後世研究者在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與辯證神學關係上的基本進路，即重構陀思妥耶夫斯基對《羅馬書釋義》第二版乃至早期巴特究竟產生何種觀念性影響。2010年，瑞士蘇黎世神學出版社推出《羅馬書釋義（第二版）》學術校勘本，標誌着國際辯證神學研究步入一個嶄新階段，與此同時，德語學界對這部經典著作的歷史研究也日益聚焦於巴特與同代神學流派及文化思潮之間的對話關係，在這個晚近逐漸形成的研究路向中，筆者構思並完成博士論文《面向終末的生命：卡爾巴特與愛德華圖愛森早期著作中的陀思妥耶夫斯基（1915年至1923年）》^②，對陀思妥耶夫斯基與早期辯證神學的關係以及《羅馬書釋義（第二版）》的內在結構提出了新見解。論文第一指導教授莫爾特曼（J. Moltmann）與第二指導教授施威博（Ch. Schwöbel）評分均為最優等（summa cum laude）。該論文2016年4月在德國Neukirchener出版社出版，先後獲得圖賓根大學新教神學系2015至2016學年最佳博士論文與博士考試獎，2017年度恩斯特伍爾夫雙年獎及2017年度曼弗雷德勞滕施萊格獎。

本論文採用的方法是德語學界常見的發展史重構（entwicklungsgeschichtliche Rekonstruktion），側重於在文本分析的基礎上展現研究對象變化發展的脈絡。筆者將這一方法運用到解析《羅馬書釋義（第二版）》所包含的終末性“透視主義”（Perspektivismus）這一問題上，入手點為巴特與其思想伙伴圖愛森1915年至1923年對陀思

^① K. Barth, *Römerbrief* (Zweite Fassung) 1922, hrsg. von C. v. d. Kooi/K. Tolstaja (Zürich: Theologischer Verlag, 2010), S. 7.

^② L. Hong, *Leben vor den letzten Dingen. Die Dostojewski-Rezeption im frühen Werk von Karl Barth und Eduard Thurneysen (1915-1923)* (Neukirchen-Vluyn: Neukirchener Verlag, 2016).

妥耶夫斯基的解讀，處理的文本類型涵蓋書信、講章、報刊文章、授課講義、論文與論著。該論文共由五章構成，標題依次為“終末論與生命”“第一階段（1915年至1919年初）”“第二階段（1919年底至1921年）”“第三階段（1922年至1923年）”與“批判性評估”。

第一章着重分析了巴特的終末論概念與生命概念在1919至1922年間的漸變過程，指出兩者的內在關聯最終落實於“面向終末的生命”（*Leben vor den letzten Dingen*）這一貫穿《羅馬書釋義（第二版）》終末論及其解釋學原則的神學人類學概念之上。^①按巴特本人的表述，這一所謂“面向終末的生命”即“與上帝相關的生命，處於審判和應許之下的生命，雖以死亡為特徵，卻又通過作為永生之希望的基督之死獲得資格的生命”^②，生命現象的特徵在於它持續超出自身，指向作為生命之危機與拯救的上帝，辯證神學蘊含“生命神學”（*Lebenstheologie*）的向度。這一章主要分析了巴特的三篇重要早期論文《社會中的基督徒》（1919）、《對當今神學的未解之問》（1920）、《聖經的問題，洞見與展望》（1920）以及《羅馬書釋義（第二版）》（1922）。

第二章首先梳理了圖愛森與巴特的通信對理解早期巴特思想的意義，以及對這些通信的編纂工作經歷的四個階段；其次，分析巴特1915年至1919年提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三封信件；然後，以此為綫索解讀巴特1919年初的兩篇論文《布爾什維克主義》與《俄國革命1917》，指出巴特和圖愛森此時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理解與俄國革命及俄國性兩個問題語境密不可分，這也是當時德語知識界的主流認知模式；在實地考察瑞士巴塞爾巴特檔案館和巴塞爾大學圖書館資料的基礎上，筆者在該章最後一部分重構了巴特與圖愛森涉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藏書目錄，評估了兩者對這位俄國作家生平與著作的熟悉程度，以及他們對20世紀初期德語世界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狀況的了解

^① A. a. O., S. 52-61.

^② Barth, *Römerbrief* (Zweite Fassung), S. 683.

程度。^①

第三章構成全書重心。本章首先分四階段梳理巴特與圖愛森在這一時段的三十五封通信和一張明信片，這些文本生動記載了巴特和圖愛森如何從俄國革命與俄國性的理解框架中掙脫出來，逐漸形成以“面向終末的生命”為核心的解讀方向。^② 值得注意的是，1921年4月之後，圖愛森在同名演講^③ 的基礎之上開始寫作《陀思妥耶夫斯基》^④ 一書，在此過程中，他不僅繼續承擔着對巴特《羅馬書釋義（第二版）》初稿的審校與潤色任務^⑤，更把自己對形成中的《羅馬書釋義（第二版）》的理解寫入自己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而這本

^① L. Hong, *Leben vor den letzten Dingen*, S. 78-82.

^② A. a. O., S. 85-118. 2015年, Katja Tolstaja 博士編輯出版這些書信: E. Thurneysen, *“Das Römerbriefmanuskript habe ich gelesen”*: Eduard Thurneysens gesammelte Briefe und Kommentare aus der Entstehungszeit von Karl Barths Römerbrief II (1920-1921), hg. von Katja Tolstaja (Zürich: Theologischer Verlag, 2015).

^③ 這篇演講圖愛森發表於1921年4月25日，但演講底稿已經遺失。

^④ E. Thurneysen, *Dostojewski* (München: Chr. Kaiser Verlag, 1921).

^⑤ 在寫作《羅馬書釋義(第二版)》(1922)期間，巴特對圖愛森提出的修改建議大都直接採納。比如巴特在詮釋《羅馬書》第十四至十五章的文字中有這樣一段話：“我們在羅馬書的結尾處（就像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說的結局處那樣）只會被重新放置在生活中（也包括基督徒的生活和基督徒的團契生活！）所包含的無法看透的困境中，找不到出路，只能再次從頭開始，重新審視我們關於上帝的談論把我們逼入的困境。”這一段的原文為：“Nur aufs Neue werden wir am Ausgang des *Römerbriefs* (wie etwa auch am Ausgang der Romane *Dostojewskis*) vor die undurchdringliche Problematik des Lebens (auch des christlichen und des christlichen Gemeindelebens!) gestellt, auf dass wir keinen Ausgang finden, sondern erst recht wieder von vorne anfangen, nur immer neu die Bedrängnis sehen sollen, in die uns unser Gespräch über Gott gedrängt hat.” K. Barth, *Römerbrief* (Zweite Fassung), 674. 如果參考圖愛森1921年9月22日寫給巴特的信，可以發現他給巴特提出的修改建議與書中文段驚人地類似：“這裏有無可能以及是否合適提一下陀思妥耶夫斯基？大致可以這樣寫：我們在羅馬書的結尾處（就像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說的結局處那樣）只會被重新放置在生活中（也包括基督徒的生活和團契生活！）所包含的無法看透的困境中，找不到出路，不得不再次從頭開始，重新審視逼我們談論上帝的困境。”這一段的原文為：“Ist hier eine Erinnerung an Dostojewski möglich und angezeigt? etwa so: Nur aufs neue werden wir am Ausgang des Röm. <er>briefes (wie etwa auch am Ausgang der Romane *Dostojewskis*) vor die undurchdringliche Problematik des Lebens (auch des christlichen, des Gemeindelebens!) gestellt, auf dass wir keinen Ausgang finden, sondern erst recht wieder von vorne anfangen nur immer neu die Bedrängnis sehen müssen, die uns in unser Gespräch über Gott gedrängt hat.” E. Thurneysens Brief vom 22. September 1921 (an Karl Barth), Karl Barth Archiv. KBA. 參L. Hong, *Leben vor den letzten Dingen*, S. 111-113.

書在1921年7月正式成書出版之後，又反過來給繼續寫作《羅馬書釋義（第二版）》的巴特以靈感。

除書信以外，本章處理的其他文本主要包括巴特的論文《社會中的基督徒》，兩篇講章與論著《羅馬書釋義（第二版）》，圖愛森的論文《宣講的任務》和論著《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分析完巴特與圖愛森這一時期的通信之後，本章依次解析了巴特在《社會中的基督徒》和兩篇講章中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解讀，然後聚焦於《羅馬書釋義（第二版）》正文中涉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三十處引證性或影射性文段。這些文段表明，巴特對這位俄國作家及其作品的提及大多為行文需要，具有高度隨機性，而且，與同期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者類似，他傾向於把作家本人直接等同於其所創造的人物形象；唯一例外是《卡拉馬佐夫兄弟》中的“宗教大法官”，《羅馬書釋義（第二版）》中涉及這個人物形象的文段有九處之多。對巴特而言，“宗教大法官”成為人在宗教與社會中背叛上帝自由的象徵化表達，堪稱他此時所進行的宗教批判與社會批判的骨幹性觀念。

如果僅僅透過《羅馬書釋義（第二版）》去評估巴特與圖愛森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解讀，那麼這個解讀所包含的理論價值將被掩蓋，因為就根本而言，巴特這部著作的三十處文段只是碎片性地記錄了兩位神學家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局部認知，能夠體現其整體性理解的文本載體是圖愛森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問題的關鍵在於揭示這個整體性理解的核心結構。在分析了圖愛森的論文《宣講的任務》之後，本章以較大篇幅重構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基本結構，指出圖愛森透過對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及小說世界的解讀，把“面向終末的生命”這一辯證神學的生命神學維度進一步拓展為此岸的生命圖像與其彼岸焦點的透視學關係。按照圖愛森的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人物形象的獨特之處在於，這些形象所包含的綫條沒有局限於二維平面，而是超出自身，指向上帝這個永遠處於彼岸的焦點。對陀思妥耶夫斯基而言，從此岸出發，取消彼岸焦點或者使其此岸化，兩者都意味着對

生命圖像的毀滅；與此同時，生命圖像與其彼岸焦點的內在關聯中又蘊含着兩者之間不可消除的“終末論張力”^①，這一張力的消解唯獨取決於從彼岸而來的神性行動（Akt），按照巴特在《羅馬書釋義（第二版）》中的語言模式，這意味着永恆突入時間，而圖愛森則將之稱為“終末論張力”轉變為“終末論”^②。

在1921年6月24日給巴特的信中，圖愛森強調，《陀思妥耶夫斯基》是《羅馬書釋義（第二版）》的“圖解”（Illustration）^③，原因正在於它透過生命圖像與彼岸焦點之間的張力與關聯，形象表達了《羅馬書釋義（第二版）》中“面向終末的生命”與“復活的透視焦點”（Fluchtpunkt der Auferstehung）^④之間的透視主義結構。在巴特與圖愛森這裏，透視主義的基本涵義即是在二維空間內繪製三維圖像的透視法，尤其是畫面線條對畫面焦點的指向。除此之外，《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及《羅馬書釋義（第二版）》中的透視主義還與尼采遺稿中提及的透視主義^⑤在兩方面意義近似：首先，透視主義意味着借助特定視角觀察並解釋對象，以實現支配與統治。在巴特這裏，“復活的透視焦點”表達的即源自上帝主權（Souveränität Gottes）的彼岸視角的確立，由此出發，透視脫離上帝的世界在諸多此岸視角的競爭中陷入的危機，宣布創造主和救贖主對世界的獨一統治；其次，借助特定視角所進行的透視是賦予意義的活動，“復活的透視焦點”確立的上帝主權視角是針對此岸生命的“彼岸性意義賦予”（jenseitige Sinngebung）^⑥，上帝對世界的統治不是讓文化以及價值虛無化的災難，而是兩者在終末論語境中的奠基與充實。《羅馬書釋義（第二

^① E. Thurneysen, *Dostojewski*, S. 38.

^② A. a. O., S. 39.

^③ L. Hong, *Leben vor den letzten Dingen*, S.106f.

^④ Barth, *Römerbrief* (Zweite Fassung), S. 600.

^⑤ F. Nietzsche, *Nachlass 1885-1887, Kritische Studienausgabe*, Bd. 12, hrsg. von C. Colli und M. Montinari (München: Deutsche Taschenbuch Verlag, 1999), S. 114; 140.

^⑥ Barth, *Römerbrief* (Zweite Fassung), S. 265.

版)》強調終末論的優先性，意圖正是確立這一上帝主權的視角，再由此出發，揭示世界既深陷危機又充滿盼望，巴特在這部著作中鋪陳的文化批判、社會批判與宗教批判源於這一視角。圖愛森對辯證神學的貢獻絕不只是修改並潤色巴特的《羅馬書釋義(第二版)》草稿而已，更為重要的是，他提出的透視主義觀念“圖解”了這部經典的核心論說結構，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書不可磨滅的理論貢獻與神學地位所在，它和《羅馬書釋義(第二版)》互為姊妹篇，分別記錄了兩位神學家從1920年深秋至1921年初秋所經歷的同一個神學發現，正是這個關於上帝主權視角的神學發現奠定了兩部著作內在的平行性；另一方面，從“面向終末的生命”與其彼岸焦點的透視主義關係出發，圖愛森與巴特發展出了具有原創性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解讀進路，超越了同時期德語斯拉夫學界對這位俄國作家的詮釋水準。

第四章首先分析了巴特與圖愛森1922至1923年涉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九封通信；在此基礎上，本章考察了圖愛森在完成《陀思妥耶夫斯基》之後如何繼續深化自己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理解，處理的文本是圖愛森的報刊文章《陀思妥耶夫斯基與社會主義》以及論文《邁向文化》，在前一文本中，圖愛森強調，這位俄國作家政治觀點保守性的根源是其對上帝這一彼岸視角的堅持，他關注的不是塵世內部具體的政治變革，而是具有終末氣質與激進性的“真正革命”^①。後一文本聚焦陀思妥耶夫斯基對文化問題的關注。圖愛森認為，儘管這位俄國作家宣告了上帝的審判之言，但這種面向終結的旨趣並不意味着他對文化和文化工作的理解是虛無主義式的，恰恰相反，他正是從“真正的終末論”^②出發關心危機中的文化重建；當然，陀思妥耶夫斯基這裏存在濫用終末論視角的可能性，尤其是當他唯獨把斯拉夫民族視為被揀選的民族，把其他歐洲民族國家看作上帝的審判對象之時，圖愛森把這種泛斯拉夫主義意識形態稱為

^① L. Hong, *Leben vor den letzten Dingen*, S. 225f.

^② E. Thurneysen, *Dostojewski*, S. 72.

“虛假終末論的激化”^①。本章的第三部分重構了巴特和圖愛森與哲學家福斯特圍繞陀思妥耶夫斯基展開的一次論戰。福斯特抨擊圖愛森和巴特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詮釋，認為兩者曲解了這位俄國作家，在他看來，陀思妥耶夫斯基思想的精華是“靈魂引導”^②意義上的道德教化，不是消解教化意義的彼岸性。巴特與圖愛森堅持，真正的德育超越一切此岸教化的手段與設計，指向生命的彼岸救贖；與成人相比，未經教化的兒童反而更能感受生命與彼岸之間的聯繫；福斯特對19世紀“教育理念與文化理念”^③不加反思的推崇是“對基督教的背叛”^④。

本章最後一部分分析了巴特在《羅馬書釋義（第二版）》完成之後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解讀，涉及文本為巴特的授課講稿《加爾文神學》，論文《當前倫理學問題》《教會與啟示》以及《論“實在性悖論”的悖論》，在這些文本中，“宗教大法官”占據了顯著的核心地位。對此時的巴特而言，“宗教大法官”的意義包含三個側面：首先，他借助神權政治取代了彼岸上帝的意志，損害了人類的自由；其次，他篡改基督的事業，試圖以人手捏造出更好的版本；最後，他也代表了前啟蒙時代壓制人類自由與自治的宗教權威。^⑤

第五章由兩部分組成，第一部分在概括性地復述第一至第四章內容的基礎上，勾勒了巴特和圖愛森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解讀從1915至1923年的變化過程，指出兩者沒有如巴特所言從陀思妥耶夫斯基那裏受到“影響”，他們借助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要探求的是其終末論旨趣在生命神學語境中的落實。這是巴特在1931年7月2日的一封信^⑥中承認自己十年之前誤解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原因所在。第二部分指出，

^① A. a. O., S. 75.

^② L. Hong, *Leben vor den letzten Dingen*, S. 235f.

^③ A. a. O., S. 238.

^④ Ibid.

^⑤ Ibid., 239-252.

^⑥ A. a. O., S. 21.

巴特和圖愛森強烈的終末論導向一方面使其陀思妥耶夫斯基解讀擺脫了“保守主義革命”陣營^①，突出俄國與德國民族利益的詮釋進路，另一方面也造成其內在的單調性；但回歸到如何理解辯證神學的終末論問題上，這兩位神學家從透視主義角度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創造性詮釋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即生命透過上帝主權這個彼岸焦點所展現出的“深層視野”^②。

這篇博士論文的貢獻有四個方面。首先，它借助巴特檔案館的材料，全面梳理了巴特和圖愛森1915至1923年涉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全部通信，尤其是兩者1919至1921年的通信，展現了圖愛森的“雙重身分”（即《羅馬書釋義（第二版）》初稿的審校者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者）在《羅馬書釋義（第二版）》文本形成史中的重大意義；其次，它表明《羅馬書釋義（第二版）》前言中關於巴特與圖愛森深受陀思妥耶夫斯基“影響”的論斷是後設視角下的虛構敘事，並不符合兩位神學家的書信交流所記錄的歷史真實，巴特與圖愛森並非“被動接受”這位俄國作家的影響，而是把“面向終末的生命”這一解讀視角投射進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物世界，並將其剝離出俄國文化語境，以此來表述並打磨自己在終末論問題上的自我理解；再次，它揭示了圖愛森在辯證神學發軔期的重要理論貢獻，即透過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解讀，把這一針對終末論的自我理解概念化為透視主義，從而為在魏瑪共和國時期競爭性的文化思想語境中解讀《羅馬書釋義（第二版）》提供了新的可能。最後，就廣義辯證神學研究而言，它修正了20世紀歐陸神學史寫作中把《羅馬書釋義（第二版）》終末論視為“災難理論”^③的解讀傳統，揭示了早期巴特與圖愛森終末論思維所隱含的神學人類學旨趣：終末不僅揭示此岸生命的有限與必死，更意味着它在彼岸上帝之“信實”中的奠基與“成像”，後者涉及的是意義的賦予，而非意義的倒空。

^① Armin Mohler, *Die konservative Revolution in Deutschland 1918-1931* (Stuttgart: Friedrich Vorwerk, 1950).

^② L. Hong, *Leben vor den letzten Dingen*, S. 264.

^③ A. a. O., S. 263f.

參考文獻 [Bibliography]

西文文獻 [Works in Western Languages]

- Barth, K. *Römerbrief* (Zweite Fassung) 1922. Hrsg. von C. v. d. Kooi/K. Tolstaja. Zürich: Theologischer Verlag, 2010.
- Hong, L. *Leben vor den letzten Dingen. Die Dostojewski-Rezeption im frühen Werk von Karl Barth und Eduard Thurneysen (1915-1923)*. Neukirchen-Vluyn: Neukirchener Verlag, 2016.
- Mohler, Armin. *Die konservative Revolution in Deutschland 1918-1931*. Stuttgart: Friedrich Vorwerk, 1950.
- Nietzsche, F. *Nachlass 1885-1887, Kritische Studienausgabe*, Bd. 12. Hrsg. von C. Colli und M. Montinari. München: Deutsche Taschenbuch Verlag, 1999.
- Thurneysen, E. *Dostojewski*. München: Chr. Kaiser Verlag, 1921.
- . *“Das Römerbriefmanuskript habe ich gelesen”: Eduard Thurneysens gesammelte Briefe und Kommentare aus der Entstehungszeit von Karl Barths Römerbrief II (1920-1921)*. Hg. von Katja Tolstaja. Zürich: Theologischer Verlag, 2015.